

中国

中医文化 传播史

王明强 张稚鲲 高雨 著



中国中医药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中国中医
文化传播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CZH167）

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

王明强 张稚鲲 高 雨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 / 王明强, 张稚鲲, 高雨著.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32 - 2796 - 4

I. ①中… II. ①王…②张…③高… III. ①中国医药学—
文化传播—医学史—中国—古代 IV. ①R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8031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6.5 字数 530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32 - 2796 - 4

*

定价 5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

序

中医学是中国科技和文化的瑰宝，其本身孕诞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之中，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辨证施治、处方用药，乃至病后康复，皆彰显出浓厚的文化底蕴，其独具特色的养生学说更是中华文化孕育出的精华。因此，在中医继承发展面临诸多困境的当下，从不同视角审视和研究中医学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这也是最近几年不同领域的学者关注中医学的缘由所在。

几千年来，中医与中华民族相伴而行，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精妙幽微的一部分，荫庇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医病与治国相通，先贤常有以医病喻治国之举；许多民俗中蕴含着中医文化的元素；文学艺术中亦常常见到中医的影子，涉医文学已为学界所关注，并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中医学通过各种载体广泛传播，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承。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医学走向世界对人类的生命健康贡献颇巨，也成为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医学的传承发展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体现，在中华民族致力于文化复兴的今天，研究中医文化传播的路径、方式、特点，梳理中医文化传播的历史脉络，更显得意义重大。该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成果，是我国第一部中医文化传播史的专著。通读《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全书，亮点在在可见，兹略述数端于次。

一是全书架构思路开阔，视角选取准确。文化传播这个选题较为宏泛，涉及的面比较广，必须要居高宏视，博涉精思，并准确选取写作切入点，方能有所成，否则极易局于一隅，难成格局。该书立足于中医文化传播的载体，主要从中医典籍的出版发行、医家的行医讲学、中医的教育传承、涉医文学艺术、涉医典籍、蕴涵中医文化元素的民俗六个视角切入，另设专节述及中医文化的对外传播。书中博涉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艺术、教育、考古、民俗等诸多领域，显示出著者开阔的学术研究视野。

二是抓住时代特色，突出重点内容。该书横贯远古至晚清，历史跨度大，在采取六个视角切入以保持纵向历史描述连贯性的基础上，注意把握时代特点，注重选取具有时代特征的资料，尤其是以重要医家、医著和医事来呈现各朝代中医文化传播的特点。如金元是医学理论具有重大创新的时期，以“金元四大家”和所代表的学术医派最具代表性，该书第八章“金元时期中医文化传播”即主要围绕寒凉和易

水两大医学流派展开。

三是内容丰富全面，资料选取独具只眼。中医文化传播史的资料往往散见于各种文献，著者博采广收，资料宏富，是一部具有丰厚学术含量的力作。该书虽以中医文化的国内传播为论述重点，但同时亦关注中医文化的对外传播，每章设专节予以论述。在资料的选取上，著者也是别具匠心，如明清小说资源十分丰富，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各有特色，著者在以中医文化传播的视角审视明代文学时，根据这一朝代早、中、晚期文学作品主题由侧重治国平天下到关注市井常人生活的转变，选择《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作为三个时期的代表著作，分别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涉医文学中“救世”与“救人”、“治世”与“治人”的统一性。

当然，书中可称道之处尚有不少，在此不再一一明述。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中医都极其关注，中医也曾一度陷入社会争论的漩涡。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既有个别人对中医的误读，亦有伪中医造成的不良影响，当然也包括中医自身尚有诸多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学界也在积极地正本溯源，以正视听，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就包括《中医学学术思想史》卷，其目的正在于系统梳理中医学学术的源流，辨其真伪，明其精要。无论存在怎样的争议，中医自身的价值毋庸置疑，其疗效不容忽视，任何抹杀中医，意欲取消或削减中医的论者，或是受历史虚无主义所惑，或是别有用心，心存其他妄念。回顾历史，中医是我国科技和文化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展望未来，中医必将成为构建中国医学的坚定基石，对世界医学体系的重构具有重要价值。此书的出版定会为繁荣中医药学术研究、推动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明强硕士、博士皆随余就读，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时有真见卓识，至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后，专心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是潜心于中医国学研究，致力于探求国学对中医的影响和国学中的中医学思想，并深入挖掘中医本身的国学内涵。唯日孜孜，无敢逸豫，治学严谨，勤奋向学，近年来一直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个人专（编）著6部，发表论文20余篇，校注古医籍多部，成果颇丰。去年又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有关方面的鼎力支持下，于全国首家成立中医国学研究所，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我为他的成长感到由衷的高兴，也希望他在今后的治学道路上再接再厉，为中医国学的研究，乃至中医学和中华文化的弘扬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明强邀序于余，余嘉其勤勉踏实之风，勇毅奋进之志，欣然为之序，并愿其不断精进，道德学问双丰收，撰写出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

周 群

2015年9月29日于南京大学

编写说明

中医学孕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科学与人文的综合体。几千年来，中医学与中华民族相伴而行，其本身既浸润、熏染于中国文化之中，富有浓郁的文化气息，散发出独特而又迷人的魅力，同时又渗透到古代的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民俗等方方面面，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痕，在诸多领域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中医学的传承发展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体现，在中华民族致力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研究中医文化传播的路径、方式、特点，梳理中医文化传播的历史脉络，更显得意义重大。为此，我们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研究”。

本书为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是课题组成员的集体结晶。全书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分为十章，立足于中医文化传播的载体，主要从中医典籍的出版发行、医家的行医讲学、中医的教育传承、涉医文学艺术、涉医典籍、蕴涵中医文化元素的民俗六个视角切入，另设专节述及中医文化的对外传播，博涉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艺术、宗教、教育、考古、民俗等诸多领域，全面而又清晰地展现了我国古代中医文化传播的历史风貌。

全书由王明强统筹规划，设计撰写方案，并统稿、审稿。具体分工：引言、第一章至第四章由王明强撰写，第五章至第七章由高雨撰写，第八章至第十章由张稚鲲撰写。各撰写者对所承担的部分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付出了辛勤劳动，但由于时间仓促，学识有限，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

编者

2015年8月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中国原始社会卫生文明及其传播	(5)
第一节 中国原始人类的生存状态	(7)
第二节 中国原始人类的卫生文化	(10)
第三节 原始艺术中的卫生文化探寻	(20)
第四节 原始刻画符号中蕴含的卫生文化	(26)
第五节 原始习俗中的卫生文化探寻	(32)
第六节 原始文学中的中医文化窥探	(37)
第二章 夏商时期中医文明及其传播	(41)
第一节 甲骨文与中医文明	(42)
第二节 巫文化与中医文化传播	(52)
第三节 民俗中的中医文化	(59)
第三章 两周时期中医文明及其传播	(67)
第一节 中医文献的出现及其传承	(69)
第二节 医学教育的出现	(70)
第三节 文学艺术中的中医文化	(74)
第四节 民俗中的中医文化	(89)
第四章 秦汉时期中医文化传播	(99)
第一节 中医药文献的整理与流布	(100)
第二节 医学的教育与传承	(104)
第三节 文学艺术中的中医文化	(110)
第四节 民俗中的中医文化	(122)
第五节 早期的中外医药交流	(131)

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医文化传播	(136)
第一节 中医典籍的刊行与中医文化传播	(137)
第二节 医家行医、讲学与中医文化传播	(143)
第三节 医学教育与中医文化传播	(148)
第四节 文学艺术与中医文化传播	(150)
第五节 民俗与中医文化传播	(153)
第六节 中外医学交流与中医文化传播	(156)
第六章 隋唐五代时期中医文化传播	(159)
第一节 中医典籍的刊行与中医文化传播	(160)
第二节 医家行医、讲学与中医文化传播	(164)
第三节 医学教育与中医文化传播	(171)
第四节 文学艺术与中医文化传播	(174)
第五节 民俗与中医文化传播	(180)
第六节 中外医药交流与中医文化传播	(182)
第七章 两宋时期中医文化传播	(186)
第一节 中医典籍的刊行与中医文化传播	(187)
第二节 医家行医、讲学与中医文化传播	(191)
第三节 医学教育与中医文化传播	(196)
第四节 文学艺术与中医文化传播	(198)
第五节 中外医药交流与中医文化传播	(203)
第八章 金元时期中医文化传播	(207)
第一节 中医典籍的刊行与中医文化传播	(208)
第二节 医家行医、讲学与中医文化传播	(219)
第三节 医学教育与中医文化传播	(238)
第四节 文学艺术与中医文化传播	(242)
第五节 民俗与中医文化传播	(257)
第六节 中外医药交流与中医文化传播	(266)
第九章 明代中医文化传播	(271)
第一节 中医典籍的刊行与中医文化传播	(272)
第二节 医家行医、讲学与中医文化传播	(292)

第三节 医学教育与中医文化传播	(310)
第四节 文学艺术与中医文化传播	(317)
第五节 民俗与中医文化传播	(326)
第六节 中外医药交流与中医文化传播	(334)
第十章 清代中医文化传播	(344)
第一节 中医典籍的刊行与中医文化传播	(345)
第二节 医家行医、讲学与中医文化传播	(359)
第三节 医学教育与中医文化传播	(377)
第四节 文学艺术与中医文化传播	(382)
第五节 民俗与中医文化传播	(397)
第六节 中外医药交流与中医文化传播	(403)
主要参考书目	(411)

引 言

在世界文明中，中华文化独树一帜，从古至今绵绵不绝，且不断发扬光大，开拓创新。与人类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中医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几千年来，中医学被誉为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的奇迹。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我国古代构建起了符合中医发展规律的传承模式。这其中中医文化的传播普及功不可没。古代医学知识的普及程度是我们今日所无法企及的。《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中晴雯偶感风寒，所请的新大夫开列紫苏、桔梗、防风、荆芥、枳实、麻黄等药，宝玉看后道：“该死，该死，他拿着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的治，如何使得！凭他有什么内滞。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后请王太医前来诊治，所开药方果没有枳实、麻黄等药，倒有当归、陈皮、白芍等，药之分量较先也减了些。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儿们的药，虽然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他瞧了，还说我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狼虎药。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连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禁得起。”当时宝玉只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其对医药的了解程度令人赞叹。这虽是艺术作品中的情节，但亦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古代中医文化传播的路径和方式是非常繁杂的，除了大家熟知的医学教育传承、中医典籍的出版传播、医家的行医讲学之外，文艺和民俗载体的作用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

1. 许多医家兼通文学艺术，采用与内容相宜的文学体裁来阐述医理、药性，使中医药学术篇章焕发出文学作品的魅力

如医学入门四书《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汤头歌诀》《雷公药性赋》，分别采用了三言、四言、七言诗歌体和赋体。眼科临床著述《目经大成》不仅运用了五言、七言、绝句、律诗，还用了大量的词牌。中医药传世巨著《本草纲目》中收有采药歌多首，多搜集于民间里巷村寨，如“白头翁根宜春采，挖起根茎及时晒。保留头部白茸毛，去泥拣净好药材”等。中医药典籍的文学色彩，医理和文学性互融，使得枯燥的基础理论、中药方剂和临床各科变得容易理解和掌握，读起来生动有趣，从而帮助读者熟读和记忆，有利于中医药知识的传承与普及。

2. 将医理、药性融入艺术作品当中，使艺术作品成为传播医理和药性的重要载体

在古代，谜语、对联、酒令、趣闻、民间传说、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等都成为中医文化传播的载体。古典文学中有大量的咏药诗赋，用文学的笔触形象地描绘各种药物的形态、色泽、性味、功用。如柳宗元的《种仙灵毗诗》《种术》和苏轼的《小圃五咏：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许多散文阐述了养生观念和医理，如嵇康的《养生论》和苏轼的《问养生》都阐发了养生要旨。刘禹锡《鉴药》借医理来喻治国，正如他在文章结尾所说：“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蹶，明矣。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无论是对治病还是治国都寓有深刻的意义。小说戏曲中也有大量的中医药内容。据统计，《红楼梦》中涉及的医药卫生知识计 290 多处，描写的病例 114 种，中医病案 13 个，方剂 45 个，中药 125 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以药入戏，写成以中药名为剧中角色的剧本《草木传》（注：对于该剧是否确为蒲松龄所著，目前尚存有争议）。该剧运用戏曲中生、丑、旦、净、末等角色来编排中药，通过人格化的药物和故事化的情节，使中药的药性、功能、疗效得到形象化地展示。如第一回甘草上场的自白：“老汉姓甘名草，字元老，山西汾州府平和村人氏，不幸夫人早亡。所生一女，名唤菊花，曾许金石斛为妻，年方二八，尚未出阁。思想起来，好不愁闷人也！”唱词：“老本草有百姓，名传不朽，一个个显其能，万病无忧。谁似我性甘平，善调诸药，也善解百药毒，万古传流。惟有那戟、遂、花，与藻并谋，他四人性最烈，与我不投。那知我能温中，去灾也易，我要想立功勋，与国同休。常欲想定华夷，朝居一品，但是我年高迈，女大难留。”

3. 各地形成许多富含中医药学内容的民俗、民谚，使中医药学知识世代相传

如我国古代在立春日有“咬春”之俗，在这一天吃一些春天的新鲜蔬菜，意在迎接新春的到来。清代北京新春日献“春盘”，从士人到普通百姓都要杀鸡割肉，做面饼，“而杂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葱，冲和合菜皮，兼生水萝卜，名曰咬春”。此俗意在迎春，亦有保健防病之功效。立春，是一年之中的第一个节气，气温逐渐升高，人之阳气步步升发。为让身体顺天应时，咬春所食之物都是具有辛甘发散之特质的食物，如萝卜、韭菜等甜爽而微带辣的食品皆有散肝、护脾、升阳之功效。尤其萝卜是咬春必不可少的，立春日，再穷的人家也要买个萝卜给孩子咬春。表面看来，吃萝卜仅是一种民俗，但实际上是古人关于健身祛病的经验总结。萝卜又名莱菔、罗服、萝菔，自古就种植，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萝卜的记载。萝卜入药始见于南朝时梁代陶弘景之《名医别录》。其性平，味辛、甘，入脾、胃经，具有消积滞、化痰止咳、下气宽中、解毒等功效。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对

萝卜也极力推崇，主张每餐必食。他在《本草纲目》中提到：萝卜“可生可熟，可菹可酱，可豉可醋，可糖可腊，可饭，乃蔬中之最有利益者。”“散服及炮煮服食，大下气，消谷和中，去痰癖，肥健人。”在民间，萝卜有“小人参”之美称，并形成了许多关于萝卜保健祛病作用的俗谚，如“萝卜上市，医生没事”“萝卜进城，医生关门”“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萝卜一味，气煞太医”“吃着萝卜喝着茶，气得大夫满街爬”“萝卜上市，郎中下市”等等。

再如，正月一日有饮屠苏酒的习俗。相传屠苏为汉末名医华佗所创制，后经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加以推广流传，《千金要方》卷九“辟温”记载有屠苏酒之配剂与功效。

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岁旦屠苏酒方：大黄十五铢，白术十八铢，桔梗、蜀椒各十五铢，桂心十八铢，乌头六铢，菝葜十二铢，一方有防风一两。右七味哎咀，绛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悬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日平晓出药，置酒中煎数沸，于东向户中饮之。屠苏之饮，先从小起，多少自在。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中，能仍岁饮，可世无病。当家内外有井，皆悉著药辟温气也。

对于正月饮屠苏之俗，在历代文学家的文学作品中多有提及，如唐代顾况《岁日作》诗云：“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宋代苏轼《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诗云：“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途。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明代叶颙《己酉新正》诗云：“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梅柳芳容穉，松篁老态多。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窝。”

中医文化传播本是我国一项极其宝贵的文化传统，但却在近代中医屡遭歪曲、质疑和压制的背景下出现断裂。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兴盛，传统文化因遭到摒弃而衰落，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都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医学既因其文化特性而使其本身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导致人们对其认同度的降低，又因与传统文化的剥离，而遭遇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时至今日，仍存在诸如中医文化保护意识淡薄、中医文化研究乏力、中医文化氛围创造不够等问题。我国的中医文化氛围不但远未建立，甚至出现了“取消中医”的荒谬论调。

究竟是什么限制了中医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当然，归根结底，中医能够传承发展取决于其临床疗效。不论我们承认与否和价值评判的高低，目前的世界业已踏入“消费社会”是毋庸置疑的。对“消费”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入思考且形成独特消费社会理论的是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活动的主宰，而且已经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欲求。鲍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的最后甚至说：“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

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①。”

在现代社会，消费已经以其强大的魔力成为社会运行结构中的核心。消费逻辑已经超越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占据人们日常活动的支配地位。消费成为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进行控制的巨大力量，从而成为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的支柱。没有消费群体，任何再美好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境地，比如昆曲，比如京剧。背负着厚重文化遗产的中医，在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面临着继承、创新和振兴的历史重任。面对这样的消费社会场景，中医的振兴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人们对中医的认同和消费程度。对中医的认同度不高、消费者的接受面不广、消费量不大，振兴中医就是妄谈。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政治对中医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中医命运的重要因素则在于自身市场发展潜力与市场需求的培植。市场经济的规律是“有市场需求则生，无市场需求则亡”。中医的科技创新是中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但是“酒香还怕巷子深”。如不能为自己开拓出广大的消费群体，不能为自身开拓出广阔的市场生存空间，中医的生存和发展就会面临诸多困境。积极推动中医文化的传播，使中医文化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与日常生活中，为中医的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一项极其迫切和重要的任务。

① (法)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27-228。

第一章 中国原始社会卫生文明及其传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据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远在两三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中华大地繁衍生息。早期的人类筚路蓝缕，艰辛异常，生命是在与诸多磨难的抗争中艰难前行，这其中就包括改善生活卫生方式，与疾病做斗争，力求维护身体健康，延长寿命，顺利旺盛地繁育后代，中国的卫生文明伴随着祖先们前进的脚步而得以孕诞、萌芽。

对生命健康的关注应该说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但苍莽的远古时期始终弥漫着神奇的迷雾，当我们探寻原始时期卫生文化的踪迹时，迷障重重。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不过距今才短短的三四千年。远古时期的人类虽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拥有着其他物种所无法具备的创造力，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推广并普及着健康卫生文明。我们可以想见，史前文明传播的主要方式为实践教化、口耳相传。正如谷食的推广、火的使用，“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管子·轻重戊》）除此之外，原始人类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来呈现对卫生文明的认识，用刻画符号记载卫生文明的思想理念，在文化习俗中渗透着卫生文明意识。古代典籍中关于原始社会的文献记载虽经后世加以整理，但从中我们亦可探寻到原始卫生文明留下的印痕。

原始社会虽然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山河阻隔，交通不便，但考古发现，不同的文化却存在着交流与碰撞、渗透和影响。尤其是生存环境优越、地处大河流域、成为人类居住中心、创造了特色文化的区域往往会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如史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会对周围形成文化辐射。

一、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

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曾向四面八方传播。其中，从关中西部起，经渭河、黄河、汾河而向内蒙古河曲与西辽河、大凌河传播，当地的红山文化有不少仰韶文化的因素。两种文化的碰撞和结合，使红山文化飞跃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个中心地区。

二、中原仰韶文化

中原仰韶文化晚期开始衰落，此时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崛起，对中原文化产生强烈影响。在郑州大河村遗址早期已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晚期这种因素更是倍增。大汶口文化同时也向南方传播，如拔牙风俗就远及江苏、上海、福建、两广、贵州等地区^①。

三、原始时期文化的传播方式

原始时期文化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迁徙

远古时期迁徙经常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前，人类基本生活在热带和温带地区，人工取火的发明使人类开始向寒冷地区迁徙，导致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广为分布。新石器时代，随着人口的增加、谋生能力的提高，迁徙活动十分活跃。如大汶口文化晚期人们沿着淮河及其支流向西移动，因此，在安徽北部、河南东部、中部都有大汶口文化遗迹。随着迁徙移民，文化必然随之传播。

2. 通婚

自氏族产生以来，先在氏族间发生走婚，后来突破氏族界限，通婚范围不断扩大。人们在通婚过程中势必会带去外氏族、外部落的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加强文化传播。

3. 战争

在原始社会已经有了战争，先是血族复仇性质的战争，私有制确立后又发生了频繁的掠夺战争。战争亦可促进文化交流。比如在苏北新沂花厅遗址北区有 62 座墓，随葬品既有大汶口文化陶器，也有良渚文化的玉器和陶器，可能就是良渚文化征服当地的产物。

4. 交易

交易往来起源较早，有些文化渗透可能就是通过交易实现的^②。

原始人类的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间传播，这其中亦包含有卫生文化的内容。

① 宋兆麟. 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卷).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587-588.

② 宋兆麟. 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卷).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589-591.

第一节 中国原始人类的生存状态

远古时期，天荒地荒，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地球上的动物界在某个时段发生了质的飞跃，人类从众多动物中脱颖而出，开始书写人类自己的历史篇章。远古时代的人们穴居野处，结绳而治，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由于历史的极端久远，我们这些人类的后代已经无法去准确地描述我们祖先原始的生活场景，只能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来大体描绘远古祖先们的生存状态。

据考古发掘，我国境内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迹广为分布，如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的元谋人文化遗迹、1963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蓝田人文化遗迹、1921年发现的北京人文化遗迹、1953年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带发现的丁村人文化遗迹、1930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发现的山顶洞人遗迹，以及马坝人、长阳人、资阳人、柳江人、河套人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全国各地，如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间，其文化遗存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包括甘肃的天水地区和泾水上游，陕西洛河中上游和汉水上游，晋西南地区，豫西地区等^①；1928年在山东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的龙山文化，以山东地区为典型，在河北、河南、陕西等省区相继发现，其年代距今约4500~4000年，前后延续达500年^②。此外还有甘肃、青海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湖北的大溪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浙江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内蒙古东部和辽西的红山文化，云南、西藏的新石器文化等^③。总之，我国境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异常丰富，反映出我国先民旺盛的生命力和顽强的生存开拓精神。

上古之世曾经成为人们艳羨和讴歌的对象，如《老子》第80章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庄子·马蹄》云：“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羈而游，鸟鹊之巢可攀缘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问·上古天真论》亦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上述论述皆

① 张宏彦. 关于仰韶文化时空范围的界定问题. 考古与文物, 2006(5): 66-70.

② 张万春, 何德亮. 城子崖遗址与山东龙山文化. 史前研究, 2004: 173-181.

③ 李经纬, 林昭庚. 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 17-18.

是从心之纯正无欲着眼，以与人欲横流的当下作比较，其目的在于教化大众。而实际上，上古之世人类实属生之不易。原始人类面对着恶劣的生存自然环境，饮食营养不良，卫生健康保障不足，导致他们疾病丛生，寿命低下。

1. 原始人类牙病发病率很高

考古发现，早在史前时期，牙周病、氟牙症、龋病、牙槽脓肿、磨耗症等多种口腔疾患多发。如江苏邳州市大墩子遗址 113 具人类下颌骨中，有 46 具患牙周病，占下颌个体数的 40.7%。若以保存于下颌上的患齿计算，牙周病齿数 172 个，患牙占牙齿总数的 16.6%。下颌龋齿计有 66 个，占全部观察齿数的 6.4%。有的牙齿因过分磨耗导致齿髓腔暴露。还有一些下颌生前患有齿槽脓肿^①。位于贵州南部兴义县猫猫洞旧石器晚期遗址曾发现 4 个下颌体，共 25 枚牙齿，几乎全部牙齿有氟牙症的遗迹。因氟牙症的病变，使得牙齿齿冠疏松脱落，4 个下颌骨的全部门齿和一部分犬齿生前已经断裂，仅留下齿根部位^②。牙病的高发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自然环境的恶劣、饮食条件的低劣、口腔保健的缺乏等。

2. 原始人骨科病较多

原始人骨骼化石中常见有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骨结核、骶骨和腰椎变异、股骨弯曲增大和骨髓炎等骨科疾病。杜百廉等人从 1971~1997 年在考古挖掘现场对舞阳贾湖（距今 7000~8000 年）、浙川下王冈（距今 6000~7000 年）、郑州市北郊大河村（距今 6000~7000 年）、荥阳青台（距今 5000~6000 年）、孟津竹里（距今 4000 年）、郑州市内商城（距今 1093~1382 年）6 个遗址中的 686 具骨架进行了观测，其中增生性脊椎炎属椎体退形病变，发病率分别为 14.45%、3.03%、28.57%、19.29%、64.71% 和 16.66%。另外还发现骨髓瘤、类风湿性下颌关节炎、腰椎压缩性骨折、桡骨尺骨干骨折、股骨骨折、小腿胫腓骨复合骨折、慢性骨髓炎等骨病^②。在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骨骼中，发现多种病态，如 M2 八具人骨架中，6 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骶骨与腰椎变异，8 号骨架为一中年男性股骨弯曲增大。M16 六具人骨架中，10 号骨架为一老年男性生前腰椎骨结核形成骨桥^③。

3. 难产是远古时期孕妇的大敌

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 M55 为一座成人婴儿合葬墓，其中成人仰身直肢葬，婴儿位于成人的两大腿之间，头朝下，很像是产后死去同时埋下的^④。邳州市大墩子 199 具人骨，死于 14~23 岁者 21 具，其中女性 13 具。对于原始时期和历史早期的人在

① 韩康信，陆庆伍，张振标．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2）：125-141.

② 杜百廉，臧卫东，景润峰，等．对河南考古出土人骨骨病的研究．//．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论文集《面向 21 世纪的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下册），1999，616-617.

③ 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文化馆．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1）：41-53.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2）：29-62.